

金 日 成

关于改进高等教育工作

朝鲜·平壤

197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金 日 成

关于改进高等教育工作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高等
教育省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4



目 录

- 一、关于实现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化和革命化…… (1)
- 二、关于在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
 牢牢地树立主体…………… (14)
- 三、关于进一步提高干部培养工作的质量…………… (28)

一、关于实现知识分子的 工人阶级化和革命化

高等教育省是负责干部培养工作的重要国家机关。管生产的省，搞好对工厂、企业的经济技术指导就可以。而高等教育省本身的任务是，要搞好教育人的工作。高等教育省不是单纯的行政机关，而是思想教育机关。

高等教育省要指导大学教员，使他们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忠于党的干部。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高等教育省可以说是教育教育工作者的机关。因此，高等教育省的干部的党性和思想觉悟水平，就应当比谁都高。

但是，从这次会议上暴露出来的缺点来看，高等教育省的同志们的思想水平并不比管生产的省的工作人员高。在高等教育省的干部中间，还存在着很多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党性、阶级性、人情非常缺乏。

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在民主革命中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发挥了积极性，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就不怎么积极了。我们的革命不断向前发展。今天，我们党为了最

终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正在展开深刻的思想斗争。

没有根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这次必须接受批评。同时这些人若不愿在革命中成为落后分子，就必须通过这次批评，同小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改造思想毛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锻炼思想的熔炉，就是党员和群众的严格的批评。干部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情，首先要通过党支部会议和基层党组织会议，以及在工人阶级等劳动群众中不断地受到检验和锻炼。在熔炉里面，你怎么顽固也是枉费心机的。在那里，不是炼成钢就是炼成铁，二者必居其一。有旧思想的人，进到群众批评的熔炉里去，那是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的。

要想帮助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纠正坏习气，就要加强党组织生活，党内造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如果认为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一番严格的批判，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是不对的。同志们要继续展开批判，帮助有思想毛病的人纠正错误。

同时，受到批评的同志也要鼓起勇气，改正缺点。受到批评就灰心丧气，或者对批评的同志进行报复，这都是不应该的。应当把提出批评的同志看作是自己的恩人，对他更亲。只有这样，下级人员才敢于批评干部，干部们才能在群众的监督下搞好自己的工作。

不愿意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的人，势必犯大错误。一个人小资产阶级思想越多，就越不愿意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这是必然的。因此，对这些人更要加强监督。

一个人若是脱离党的监督，就会自高自大起来。如果，自高自大的行为发展到目无群众、任性放肆、以及目无党组织的地步，那就不能看作是单纯的自高自大了。这是走向反党道路的第一步。

同志们在发言中提到了有意识的反党还是无意识的反党的问题。反党行为，都是有意识的。不能认为只有提出宗派性纲领而干出反党勾当的才是有意识的反党行为。

一个人如果总是从各方面来掂党的政策的分量，合自己口味的就执行，否则就不执行，这已经是有意识的反党行为了。这种行为稍微发展下去，就是公开诋毁党的政策，为了反对党，庇护自己而去拉拢别人。这样一来就会堕落成为有组织的宗派了。

因此，各级党组织要经常加强党的生活，以防止人们自高自大、闹个人英雄主义。这不仅对干部们需要，而且对所有的党员都需要。

无论是谁都有旧思想残余，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工人和农民中间也有。尤其是在脱离生产活动的知识分子中间，旧思想残余就更多。在高等教育省、普通教育省、

科学院和大学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小资产阶级思想就多。通过这次会议，我切实地感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更要实现革命化。

目前，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会有各种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一部门的干部缺乏思想锻炼。如果，教育省的干部和教员都具有党的修养、共产主义修养，还具有高度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那末教育工作是不会搞不好的。

同志们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马列主义著作，就具备了共产主义修养。知识分子阅读很多书，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不在于读了多少马列主义著作，而是在于怎样把马列主义付诸实践。一个人不管懂得多少马列主义命题，如果不会把马列主义化为自己的思想，在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圈子的人。

同志们也许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但已经暴露出来的事实证明，高等教育部门干部还存在很多旧思想残余。

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你们认为一个大学教员一年讲一千个小时课是多的。这是不对的。计较时间多、时间少，就不是革命者的态度。如果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他就会想方设

法去做更多的工作，而不会计较时间。

共产主义者是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精力去进行斗争的，并为此感到最大的喜悦和骄傲。因此，革命虽然艰苦，但革命者一向光明爽朗、朝气蓬勃、充满着革命热情。

高举共产主义的红旗展开斗争，在斗争中牺牲，这对革命者来说是最大的光荣。前仆后继，继续高举红旗开展斗争，最后，革命必将取得胜利。

同这样的革命者的品质比较起来，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还差得远。一年一千个小时的话，平均每天三个小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做或许可以，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连三个小时的工作都不做，是不能吃饭的。

当然，教员编写新的教案是需要时间的，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一天做三个小时工作，把其余的时间好好利用起来，就能写好教案，还完全可以进行学习。没有时间看书，这是说不通的。

会议多就不满，这也是不对的。会议有时也许多一些。但过政治生活的人总不能不开会。

说什么会议多、没有时间，这都是一种借口。工人们每天在高炉前汗流浹背地进行七八个小时的紧张劳动，他们既参加会议又参加学习，从来也没说过一句累。

前几天，我到殷栗矿山访问了一个工人家庭，同这家

大嫂谈过话。据这位大嫂说，她的丈夫是个机器操作工，每天早晨七点左右就去上班，下午五六点左右下班。回来吃过晚饭，马上又夹着书包到学校听课，到十一点才回到家。这样做，睡眠时间是可能不足的。可是这个同志对这样紧张的生活却从没发过牢骚。

同这样的工人比起来，大学教员的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目前，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工作做。要想尽早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知识分子就要做更多的工作。

实际上，直到现在，高等教育省所属的大学每年培养出不止技术人员和专家，但是其中很多人都被分配去当大学教员，所以分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人就不多。目前在工厂和农村，知识分子很少。到合作农场里看一看就有这种情况：由于找不到一个能做会计的人，浪费许多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

如果，大学教员们稍微关心国家情况的话，应当下决心把现在十个人搞的工作，由七八个人或五个人担负起来。剩下的教员如果派到工厂或农村里去，他们就能做更多的工作了。

然而，现在我们的大学教员，不想多作些工作来帮助工人和农民，反而闹情绪，说什么国家给他们的工作太多。如果让他们到生产单位或中学去，他们就觉得职位降

低，表示不满。不想帮助工人和农民，这说明我们的教员还没有实现工人阶级化和革命化。这是由于高等教育省没有很好地教育大学教员的缘故。

其次，看一看教员们对报酬的态度吧。现在大学教员们虽然每月由国家领取生活费，但讲课超过了规定时间还领超过部分的讲课费，写了稿，又领稿费。

据最近的汇报，教员们对没有报酬的工作就干脆不想做。甚至连编写函授教材这样的工作，他们都嫌稿费少而不愿意搞。据说科学院的同志们所以不愿意到大学讲课，也是同报酬有关。

把报酬当作问题的话，就不能成为革命者。过去革命者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但他们英勇奋战，甚至献出了生命。把不取报酬而多讲几个小时课或多写几篇稿子看作是很大的负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马克思并不是领了什么稿费才写了《资本论》的。马克思写了很多文章，不仅没领到稿费，反而遭到了资本家的迫害，生活困苦不堪。可是他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精力去写了文章。

在大学里讲课，这是真正光荣的事情。同时，为人民群众写出好文章、编出好书，这也是令人愉快而又有意义的事情。世界上羡慕大学教员的人多得很。他们想：如果

能在大学里讲一堂课或编一本好书，那该多好啊！可是他们没有资格讲课，没有能力写稿，所以怎样羡慕也做不到。我们的知识分子既能讲课又能写稿。然而对这样光荣的工作，他们却非要拿钱才肯做。

我们的教员不应当成为那种为几个讲课费、稿费而工作的雇佣，而应当成为为培养共产主义者而斗争的革命者。为讨几个钱而讲的课，是不会有共产主义精神的。

当然，保障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必要的。生活有了保障，就应该放弃挣钱思想。

我们的社会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要有一定的国家制度，工资也应当有些差别。在东西还不很充足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搞平均主义的。但是，我国的工资差别并不大。我们正在朝着逐步更加缩小这种差别的方向前进。

我们打算在七年计划完成以后提高工资。到那个时候，工资少的人就多提，工资多的人就少提一点，好让所有的人都能过好日子。

大学教员的生活比小学教员的生活强得多。所以不存在因为生活得不到保障而不能工作的问题。

归根结蒂，问题在于思想。大学教员念了好几年书，又看了很多书，可是对金钱却那样吝惜，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根除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

检查一下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的履历就可以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解放后由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新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在新的社会成长起来的，在我们的大学里念了书。所以，这些同志并不是旧社会里受到思想影响的。

那末我们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推翻了旧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在我国，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资本家。但是，在我们社会里许多旧思想残余仍然存在，而且会长期存在。曾经教过同志们的老师也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同志们的周围也有不少有旧思想的人。

旧思想还从外部不断地侵袭进来。在我国的南方土地上，美帝国主义者、地主和资本家以主人自居。旧思想不断地从南朝鲜侵袭进来。

同时，别的国家的洋风、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也会侵袭进来。

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在我们内部的旧思想残余就会复活，从外部侵入的旧思想，就会使我们的头脑糊涂。因此，即使在我们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如果不经常教育他们，也会产生思想毛病。

要使我们的知识分子忠心耿耿为革命服务，就必须不

断地同残存在我们社会里的旧思想残余和从外部侵入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要对资产阶级个人利己主义思想提高警惕，这是必要的。

我国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极其短暂的。我们是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就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因此，我国人民的资本主义个人利己主义思想原来比较少。

据说在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欧洲国家，兄弟俩到饭店吃饭还要各拿自己的钱；父子之间的金钱账也算得非常严格。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可是他们却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们讲了课就一定要领讲课费，写了稿就一定要拿稿费，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国根本不需要机械地照搬那些经历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实行的制度。如果把它照搬过来，那就等于在我国人民中间助长利己主义。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设共产主义。要想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根除利己主义思想。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在人民中间助长利己主义，然后再去辛辛苦苦地根除它呢？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们在搞农业合作化的时候，考虑到农民的思想水平各不相同的情况，规定了合作社的各种形式。最初我们告诉农民们搞变工组。可是我国农民却看不起它，说变工组

祖先们已经搞过了，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因此，大部分农民一开始就选定了最高的形式——第三形式。有些人曾说，我国的合作化运动速度太快了。但是，我们党积极支持了那些一开始就要求高级形式的农民的愿望。如果我们机械地效仿别国的经验，那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地完**成象农业合作化这样艰巨的革命任务的。**

在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同经历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相比，我们就有许多有利条件。

外国的一位代表访问了青山里之后说，他看到我国农民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深受感动。听他说的倒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说，他到青山里一看，村前有一条大公路，可是农民们却敞着门下地去干活。他说在他们国家，出门一会儿，也必须把门锁牢。他接着赞扬说，朝鲜人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互相信任，互相爱护。

古时，我国人民晚上睡觉也是不关门，连篱笆都没有。只有地主的房子才砌有围墻。如果村里的某个人偷东西或干出其他坏事，那他就呆不下去，要被赶走的。

我们党在继续发扬我国人民所固有的这种良好风尚和美德的同时，还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劳动人民。可是高等教育省不但不积极发扬我国人民的良好风尚和美德，反而机械地效仿今后在别国也都应抛弃的制度，在我国的知识

分子中间助长利己主义。

现在还不算晚。高等教育省要取消仿效别国而制定的错误的制度，在教员中间大力开展反对个人利己主义的思想斗争，使他们不是为金钱而是为革命而工作。

知识分子为了增强党性、阶级性和人情，必须积极参加思想斗争。只要斗争开展得好，就都能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

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所以有动摇性，没有革命性。这是错误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革命性就不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也多得很。

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有动摇性，是事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动摇往往表现在为资本家服务，还是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个问题上。因此，在革命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对待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其动摇性。

但是在没有地主、资本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就不能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有动摇。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可走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解放后我们在工人和农民当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动摇。在旧社会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二十年来，通过跟着我们党进行的斗争，也已经习惯于为人民服